

美國的《左傳》研究*

王 靖 宇

所謂《左傳》研究，可以從兩方面來講：

第一，把《左傳》作為資料，透過此一資料來研究春秋時代的社會、政治、軍事等等情況。在這方面，比較突出的例子有許倬雲教授的《先秦社會史論》(*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這是他當年在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1965年由史丹福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寫得很成功，目前已有平裝本發行。此外，還有許教授在芝加哥大學時的老師，H.G. Creel教授的《中國國家治術的起源》(*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1970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當然，這些論著所採用的材料不全出於《左傳》，但《左傳》是他們的主要材料來源則是無疑的。Creel 教授對《左傳》的史實性十分稱許，他說：「我大量使用《左傳》數十年，對其史實根據方面的縝密可靠，越來越感到欽佩不已。」(頁476)(In working intensively with the *Tso-chuan* over several decades I have come increasingly to feel respect for the essential soundness of its historical base.)

第二，《左傳》研究的另一方面就是以《左傳》本身作為研究對象，這是我今天報告的重點。不過，在這方面的著作不多，成績只能說是平平。

在美國最早對《左傳》作出比較全面性介紹的，是原來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而現在則長住日本的 Burton Watson 教授。1962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早期中國文學》(*Early Chinese Literature*)一書。該書屬於文學史一類，寫得相當出色，夏威夷大學的羅錦堂教授曾把它翻成中文出版。Watson 在書中對「文學」一詞採取比較廣泛的定義，除了詩之外，尚有專章分別介紹中國早期歷史以及哲學方面的著作。《左傳》當然是早期歷史著作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因此 Watson

* 本文為王教授應本處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的邀請，於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師大國文系會議室所發表的專題演講。

以較長篇幅加以介紹，對於作者和成書年代、書的形式和內容以及與《春秋》和《國語》的關係等等，都作了說明和討論。

Watson 指出，雖然傳統上一般認為《左傳》作者為左邱明，但他是否即為《論語》中孔子所稱許的左邱明（《論語·公冶長》），則完全無法斷定；全書大約完成於公元前三世紀，不可能是劉歆的偽作。《左傳》和《春秋》紀事雖然相同，但卻有此有彼無，甚而相互牴觸的情況出現；因此，最初二書很可能是分立並存的。《左傳》和《國語》為獨立二書，但其中一些記載和詞句相似，那可能是由於二者所採用的原始資料相同所致。一般來說，《國語》的文字比較散漫冗長，因此其中一些篇什可能為後人寫成，較《左傳》為晚。

在介紹《左傳》時，Watson 的重點在書中的主題和文字特色。就主題而言，Watson 特別強調書中富有儒家色彩的勸善懲惡的精神。他甚至說：「《左傳》因此可以說是一本道德因果指南，一個預言體系，這個體系不是建立在數字或預兆的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更複雜的、更值得信服的、在實際的人類歷史中可覺察的道德模式基礎上的。」（頁47-48）（*The Tso is thus a handbook of moral cause and effect, a system of divination based not upon numbers or omens, but upon the more complex, but infinitely more trustworthy, moral patterns discernible in actual human history.*）他又說：「……《左傳》基本上不太像是我們所理解的所謂歷史，而更像是一篇帶有歷史外衣的討論倫理的論文。」（頁53）（*...Tso-chuan is basically less a history in our sense of the word than a treatise on ethics set in historical form.*）

基本上我同意，《左傳》裏的說教成分很重：一般來說，好人似乎有好報，惡人則似乎有惡報。但也有例外，衛國的急子和壽子（桓公16年）、晉公子申生（僖公4年）、楚國的卻宛（昭公27年）等都不能算是惡人，但都遭到迫害，最後不得善終。此外，書中還有許多敘述只能當作是實實在在的歷史記載。總的來說，我覺得《左傳》還是歷史。作者在敘事的過程中，似乎覺察到了一些倫理規則，但這並不意味著作者已先入為主地有了些道德觀念，然後借歷史事件來加以闡述而已。

Watson 對於《左傳》的文筆很讚賞，說它生動、簡潔而有力，是後代類似作品所望塵莫及的。但他也覺得，書中人名用得極為紊亂：同一人物往往在許多不同名稱下出現，作者完全沒有說明，讓讀者大為困擾。此外，書中文字有時過分簡潔，人物與人物、事件與事件之間的相互關係也交待得不夠清楚，徒增閱讀的困

難。他引用了吉川幸次郎先生的一段話，大意是說，讀者在閱讀《左傳》時，必須對每一句的涵義弄清楚，這樣才能掌握它與下一句的邏輯關係，然後繼續讀下去。作者似乎有意讓讀者在每一句末做一次「心力體操」(a mental exercise)，這樣才能得到一種「心智上的喜悅之情」(a sensation of intellectual pleasure) (頁55)。但 Watson 在引話之後，語帶幽默地說：「誠如吉川教授所說，在這種風格的作品中，我們通常必須掌握第一句的涵義，然後才能往下看第二句。但有時我們也會發現，我們必須往下看第二句才能理解第一句。有時，這兩種情況果然發生（即看懂了第一句之後又看懂了第二句，或看懂了第二句之後才真正懂得第一句），但也很難看出喜悅之情究竟從何而來。」(頁55) (It is true, as Professor Yoshikawa says, that in this style one must usually grasp the meaning of the first phrase before he can move on to the second. But in other cases one finds he must move on to second phrase before he can understand the first. And when, as sometimes happens, these two phenomena coincide, it is difficult to see where the pleasurable sensation comes in.)

其實，我倒覺得吉川先生的說法很有意思，因為他至少道出了一部分我們在閱讀《左傳》時所特有的享受。正因為書中敘事十分簡潔，文字也比較艱深，我們在閱讀時便需要全神貫注，盡量去揣摩詞義與詞義間、段落與段落間的關係。這恐怕也就是讀者反應美學中所強調的，讀者在閱讀過程時必須執行有創造性的填補「空隙」(gaps) 的任務吧。在填補空隙時，我們也許會發現作品的涵義層出不窮，但每有所領悟，便有一種新發現的興奮。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個越是成功的作家，就越能提供空間，來讓讀者對作品從事「再創造」(re-creation) 活動。《左傳》作者在這方面是十分成功的。

Watson 還談到《左傳》中對許多有名戰役的描述，並且和西方古籍裏類似的描述比較。他發現，《左傳》作者對戰前的準備工作以及戰後的善後事誼介紹得比較詳細，而對戰爭正在進行時的描述反倒不甚經意，往往只是輕描淡寫一番帶過。這就和西方古籍大異其趣了。西方古典作家遇到戰爭場面時，常常大做文章，巨細不遺地將雙方對壘的過程呈現出來。Watson 對此一有趣現象並未加以解釋，但我們也許可以這麼說：這是由於中國作家們一般喜好含蓄手法的原故。中國畫家有所謂「烘雲托月法」：要畫月亮，並不一定直接去畫，只需將月亮周圍的雲彩畫出來，月亮自然就顯出來了。《左傳》作者也許覺得，在敘述一場戰役時，既然對戰

前的準備工作以及戰後的結果已說清楚了，如果對戰役本身再大事渲染，就未免有些「畫蛇添足」了。

雖然 Watson 教授覺得《左傳》文字艱深，而且敘事由於過分簡潔以致不十分清晰，但他顯然對該書的文學成就仍然很推崇，所以後來不辭辛勞，選譯了《左傳》裏比較有名的篇章（約佔全書三分之一），又交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於1989年出版，題名為*The Tso chuan: Selections from China's Oldest Narrative History*，可以簡稱為《左傳選譯》。在譯文之前，Watson 有一篇介紹性的長序，不過對《左傳》的看法基本上和他在《早期中國文學》上相同，沒有大改變。只是對《左傳》成書時代多舉了些別家的說法，指出該書也可能是公元前第四世紀的產物。

Watson 教授是一翻譯大家，譯筆流暢清新而傳神，曾大量翻譯過先秦諸子、《史記》、《漢書》、詩賦等等，將中國豐盛的文化遺產介紹給西方世界，功不可滅。這部《左傳選譯》是他在這方面最新的成果。總的來說，翻得夠水準，比起一個多世紀前 James Legge 的翻譯來，就要顯得活潑親切得多。不過因為 Watson 的對象並不全是專家，還包括了一般讀者，為了清楚而又不使用過多的注解，所以譯文中有時加了些原本沒有的字句。下面就舉一個例子。莊公28年，《左傳》上有這樣一段話：「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Watson 的譯文是：Duke Hsien of Chin took a bride from the state of Chia but she bore no sons. He had a clandestine affair with lady Chiang of Ch'i, the concubine of his father, Duke Wu, and from this liaison were born the daughter who later became the wife of Duke Mu of Ch'in and the son, Shen-sheng, who became Duke Hsien's designated heir. (頁21) 如果真要接近原文，這段譯文其實可以簡化為：Duke Hsien of Chin took a bride from the state of Chia but she bore no sons. He had a clandestine affair with lady Ch'i Chiang who gave birth to the wife of Duke Mu of Ch'in and Crown Prince Shen-sheng. 這樣就只要加一個注，說明齊姜為何許人也，全文的意思也就清楚了。

也有時候，Watson 將原文簡化，效果近乎意譯 (paraphrase)，而不是翻譯。晉公子重耳出亡時，來到秦國，受到秦穆公的盛大招待，在宴會上穆公還賦了《詩經·小雅》中的〈六月〉一詩來恭維公子，在重耳身旁的趙衰就即刻要他表示感

謝，「公子（即重耳）降，拜，稽首。」（僖公23年）Watson 的譯文是：The prince thereupon bowed his head to the ground.（頁44）這就只翻了「稽首」一詞，「降」和「拜」二字就被省略了。這一段比較詳盡的翻譯應當是：The prince thereupon walked down the steps, made an obeisance, and bowed his head to the ground. 不過，這種將原文簡化的情況不多。

有時候，Watson 對原文誤解，因此就有誤譯的現象發生。晉獻公派士蔿去為重耳、夷吾兩位公子修築蒲和屈二地的城牆，不小心把木柴放進城牆裏，獻公知道後就派人去責備士蔿，士蔿回答說：「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僖公5年）Watson 的翻譯是：I would urge you, my lord, to cultivate virtue and strengthen the position of your heirs! Why worry about the walling of cities?（頁25）第一句翻譯得很好，但第二句就有問題了。「何城如之」的「如」字在這裏有「比得上」的意思。沈玉成先生的《左傳譯文》（北京：中華書局，1981）裏就是這樣翻譯「如」的：「君王只要修養德行而使公子們的地位鞏固，哪個城池比得上？」（頁74）所以，Watson 第二句也許應當改為 Which city walls can match these，就和原文的意思比較接近了。

Watson 誤解原文的地方還有，因為我曾在 CLEAR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學刊上（1990年12期，頁152-4）寫過一篇《左傳選譯》的書評，列舉過一些其他例子，這裏就不多贅了。

在美國對《左傳》有研究，除 Watson 教授之外，還有現執教於加州大學 Santa Barbara 分校的 Ronald Egan 教授。他在哈佛大學的博士論文就是寫《左傳》的，後來將論文中精華部分以單篇形式發表在1977年的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7.2) 上，題為〈《左傳》中的敘事文〉（“Narratives in *Tso-chuan*”）。文中主要討論兩點：第一，《左傳》作者所採用的敘事方法是「無個性的敘述」（impersonal narration）——就是說，在敘事當中，作者很少現身說法，主動幫助讀者去理解敘事的涵義和目的。因此，讀者就只有從敘述本身來揣摩作者的用意。但這並不難，因為《左傳》裏幾乎所有的預言最後都應驗了，而另一個常見的情況是：如果不聽忠告，後果一定不好。《左傳》作者在處理歷史事件時的最高原則是：一個有智慧而且為人民謀福利的君主一定發迹，反之則會失敗。說得更概括一點，就是「好人成功，惡人失敗。」（...the good succeed and the bad are brought to ruin.）（頁339）Egan 的此一看法，我大致同意。但我也覺得，他

像 Watson 教授一樣，過分強調《左傳》裏的說教成分，似乎作者只是假借歷史來闡述一些先入爲主的道德觀念。用 Egan 自己的話說，《左傳》作者的主要考慮是「倫理上因果關係的說明。」(the illustration of ethical cause and effect.) (頁 339) 我前面已經說過，事實上《左傳》裏有很多事是不能完全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個原則來解釋的。

Egan 文中第二個重點是，在《左傳》的長篇敘事中，常夾帶一些小插曲，而這些小插曲和正文並沒有什麼必然的關係。由此 Egan 推論《左傳》一書是根據本已存在的一些材料拼湊而成，不能說全由某一個人構思寫成的。他同時認爲，構成《左傳》的主要材料是以說教爲主的歷史掌故。他不同意法國漢學大師馬伯樂 (Henri Maspéro) 的說法，就是《左傳》的作者採用了大量的歷史傳說 (historical romance or fiction)，因爲書中找不出這方面的痕跡。這是相當武斷的論斷，我倒覺得馬伯樂有道理。《左傳》裏有不少和鬼有關的故事，像公子彭生借大豕顯靈 (莊公 8 年)、狐突白日與申生鬼魂相遇 (僖公 10 年)、晉景公夢大厲 (成公 10 年) 等等，都是大家比較熟悉的。此外，晉文公重耳出亡時的一些遭遇以及死後其「柩有聲如牛」 (僖公 32 年) 等描述，恐怕只能算是歷史傳說一類。總之，我個人覺得，《左傳》是由一個作者運用了當時已存在的許多材料，包括 Egan 所謂的說教式歷史掌故、真正的歷史文獻以及可能只是口傳的歷史傳說，然後自己再整理、加工、修飾而成的一部歷史巨著。

Egan 教授的研究興趣已有所轉移，目前正專攻宋代文學。

就在 Egan 教授的論文發表的同時，我自己討論《左傳》的一篇文章也發表了，題作〈從《左傳》看中國古代敘事作品〉 (“Early Chinese Narrative: The *Tso-chuan* as Example”)。這篇文章的原稿是爲了 1974 年在普林斯頓大學召開的「中國敘事文研討會」而寫的，但研討會論文集一直到 1977 年才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全集名稱就叫《中國敘事文》 (*Chinese Narrative*)。我這篇論文最大的特色，就是完全從敘事文和文學的角度來看《左傳》。那時，在美國文學界頗爲流行的一本書是 Robert Scholes 和 Robert Kellogg 合著的《敘事文的特性》 (*The Nature of Narra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他們將敘事文分爲情節、人物、觀察點 (視角) 及意義四個必不可少的要素，然後一一加以分析與討論。我覺得他們的方法很實際，因爲不論是西方敘事文或是中國敘事文，只要是敘事文，就都應該擁有這四個最低限度的要素。而且從這四個要素來

談敘事文，要比只憑主觀、印象式的評估有意義得多，因此就決定用這四個要素來分析一下《左傳》敘事的特性。我雖然用了 Scholes 和 Kellogg 的框架，但對四個敘事要素的定義卻不完全和他們一樣，而且在討論完《左傳》中的四個要素之後，還多了「成品」一節，指出諸敘事要素如何交融構成一個生氣勃勃的藝術整體。

首先談情節。情節有時間性，也有空間性。有時間性，是因為它是一個程序，一個過程。所以情節有環性的，如《三國演義》中的合久必分，久分必合；有點性的（存在的、心理的），像以夢為基準的許多故事，其間不是時間順序顛倒，就是一連串事件全部發生在鐘錶時間的一瞬間；有線性的——事件發展由一點到另一點，大多數的故事情節屬於這一類。就時間性來說，《左傳》的情節是線性的，但作者也常用「倒敘」（多以「初」字起）和「預示」的方式來打斷事件循序漸進的線性運動。

情節有空間性，是因為它也是一種設計，一種模式。《左傳》當然是一部編年史，但在編年史的大模式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傳記性的、遊記性的、戲劇性的等小模式。從襄公19年（公元前554年）到昭公20年（公元前522年）有關鄭國子產的故事，可以算是傳記性的代表；僖公23年（公元前637年）和24年（公元前636年）有關重耳出亡的描述，當然是屬於遊記性的；而書中衆多描寫得有聲有色的戰爭場面則應當視為戲劇性的，因為戰爭一定與力量大致相當的雙方衝突以及衝突的解決有關。

再談人物。故事中的人物可以用種種不同方法來加以分類——可以根據他們的社會地位和道德修養來分，也可以從人物描寫的角度來分。就人物描寫而論，人物大致可分為兩大類：「扁平的」（「靜止的」）和「圓形的」（「發展的」）。所謂「扁平的」或「靜止的」，就是在整個故事中人物的性格保持不變；而所謂「圓形的」或「發展的」則正好相反，一個人物在出場時的個性與終場時的個性相比，有所變化，有所發展。一般來說，不但《左傳》中，就是中國其他敘事作品中，靜止型的人物多，發展型的人物少。中國作者似乎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個人物性格的一些基本特徵上，在敘事時，以顯現這些基本特徵為主要目標，而對於這些特徵如何演變而來則並不太感興趣。

就《左傳》而言，作者在表現人物性格時所擅長的手法是通過人物本人的言談和行動以及其他人物對他的評論；作者對人物內心活動的直接描寫的情況是絕無僅

有的，這和下面要談到的作者在敘事時所採用的觀察點有關。

所謂觀察點，是指一篇敘事文中敘事者（narrator）所採用的視角。一般而言，有第一稱「我」和第三人稱「他」兩種。第一人稱又可分為行動參與者和旁觀者兩種；第三人稱則又可分為只具報告人身分者——僅就他所知道的向讀者報告，以及無所不知的萬能者——對於故事中人物一舉一動固然熟悉，即使他們的內心思想和內心感情也都瞭如指掌。《左傳》中所使用的觀察點為第三人稱的報告者，符合一部歷史作品的精神，所以完全沒有對人物內心活動的直接描寫。但這並非說，《左傳》中缺乏心理描寫。城濮之戰前（僖公28年），晉文公聽到輿人們唱「原田每每」，深感疑慮；後來又做了一個惡夢，夢見他和楚子搏鬥，「楚子伏己而盪其腦」，就是極為深刻的心理描寫，只是作者沒有直接告訴我們此時文公的心情而已。

現在再談意義。所謂意義，是指作品中體現出來的總體涵義。就《左傳》的意義而言，我同意 Watson 及 Egan 二位教授的看法，就是書中所展現的乃是帶有濃厚的勸善懲惡色彩的儒家人生觀。但我也認為，不應當過分強調書中的道德意味，這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基本上，《左傳》是一部歷史，不是一本說教的寓言（allegory）。書中的一些道德觀念只是作者用以解釋歷史現象的一種方法，而不是作者敘述歷史的目的。

在討論《左傳》的涵義時，我還引用了許多現代西方學者的意見來討論歷史與虛構故事（fiction）之間的關係，指出二者間只是一種程度上的區分，不是類型上的區分。

文章最後一節談到成品，以城濮之戰為例，指出情節、人物、觀察點和意義四要素如何在一部成功的敘事作品中交織在一起，彼此加強而構成一個有生氣的、不可分割的藝術整體。

近年來我在看學者們對《左傳》以及傳統小說所作文學欣賞，一般來說都過於注意作品的整體結構（這包括我自己，上面提過的對城濮之戰的賞析就傾向於整體結構）；對敘事過程則輕描淡寫，或避而不談，這是很遺憾的。因為，當我們看完一篇敘事文時，固然可以談它通篇的組織，但當我們還正在看的時候，那是一個過程。究竟在閱讀時讀者的內心反應是什麼？他在追求些什麼？這些也是很值得探討的課題。

看敘事文如果只注意故事的整體結構，就好像在看圖畫，我們欣賞的是線條和

色彩的組合，是全幅畫面所展示的情調和意境；但事實上跟蹤敘事文中故事發展的過程則更像是在聽音樂。我們在聽音樂時，會全神投入音樂的旋律，隨著旋律的轉動而興奮，而鼓舞，而哀傷。前者給人的感受是靜止的，是平面的；後者給人的感受則是流動的，是活生生的。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最近出版的《中國文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論文集》（1992）裏有我的一篇論文，題為〈怎樣閱讀中國敘事文——從《左傳》文藝欣賞談起〉，對於閱讀敘事文的過程有比較詳細的闡述。我的用意不是要貶低把敘事文當作圖畫來欣賞的「結構」家們的成就；但我也覺得，如果不注意到敘事文的敘事過程，我們對敘事文的欣賞就不夠完備。因此我希望，今後對敘事文作文學欣賞時，至少應該結構和過程並重。最好的辦法，也許是先作「音樂式」的欣賞，接著再作「圖畫式」的欣賞，這樣就比較全面了。

在美國，我還看到過一篇關於《左傳》裏「公」字涵義的論文，題為“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Kung (Duke?) in the *Tso-chuan*”，登在1973年的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tudies* (93.4) 學刊上，作者為 C.N. Tay。大意是說，《左傳》裏的「公」字，可以指爵位，但也可能是尊稱。當爵位解時固然可以譯成 duke，但作為尊稱時，它就可能可能有 ruler、prince、lord 或 his lordship 等不同意思。James Legge 在他的《春秋》和《左傳》的翻譯裏幾乎清一色地用 duke 一字，欠妥。這篇文章不長，但搜證很全，寫得不錯。但我不認識 C.N. Tay，後來沒有再看到過他有關《左傳》的論述。

此外，在許多年前的一次亞洲研究學會年會上，我曾聽過美國東岸 Seton Hall 大學的 Barry Blakeley 教授的一篇關於《左傳》的報告，題目是“Notes on the Reliability and Objectivity of the Tu Yü Commentary on the *Tso-chuan*.”大意是說，從杜預對《左傳》中職官和姓氏注釋的謹慎態度，可以看出他治學的嚴謹，因此 Blakeley 教授認為《春秋左氏傳集解》的客觀性和可靠性極高。我覺得他這篇報告很有內容，但後來好像一直沒有發表，不知何故。

以上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在美國研究《左傳》的一般情況，報告得不夠清楚或有漏失的地方，尚請大家原諒。謝謝！